



[美]刘易斯·科塞 著

Lewis Coser

郭方等译

理念人

MEN OF IDEAS
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中央编译出版社

理 念 人

——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美] 刘 易 斯 · 科 塞 著
郭 方 等 译
郑也夫 冯克利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理念人

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美]刘易斯·科塞 著
郭方 等 译
郑也夫 冯克利 校

MEN OF IDEAS

Copyright © 1965, 1970 by The Free Pres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念人/(美)科塞(Coser, L. A.)著;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ISBN 7-80109-429-8/C·68

I. 理… II. ①科… ②郭… III. 知识分子-研究-西方国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594 号

理念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E m a i l cctp@Public.east.cn.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John A. Gar

中文版序

理念人（男士和女士），虽然屡遭拒绝和蔑视，却依然在很多世纪中成为西方思想上的开路先锋。我猜想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本书致力于追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努力揭示，社会与政治的状况如何支持或阻碍着这些男士和女士们的理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中影响和铸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虽然他们也是被其时代的知识与社会背景塑造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与本书近似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研究。如果没有，本书或许能激发这种企图。

刘易斯·科塞

关于作者

刘易斯·科塞 1913 年出生于柏林。

在纳粹获取政权前离开高中。由于他活跃于左翼团体中，并由于他出生于犹太家庭，1933 年初，在获悉将被捕前，亡命巴黎。由于纳粹阻挡了家庭对流亡者的经济支持，法国政府又不允许外籍人工作，他只好打黑工，他作过推销员、秘书，以及他在晚年已经回忆不起来的多种营生。同时又由于法国当时的大学是免学费的，他幸运地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因为他懂得德、法、英三国语言，最初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向导师汇报论文题目时说，打算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德法三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导师惊讶地说，对社会结构感兴趣应该学社会学呀。这样科塞转向了社会学。法国社会学界当时完全被杜尔凯姆的传统笼罩，科塞读杜尔凯姆的书，听毛斯的课。但他厌倦这种单一的风格，便加入到马克思研究小组中，继续他在德国时就开始了的对马克思著作的学习。受德国监狱中逃出来的亨利·雅各比的影响，他告别了正统马克思主义。

1941 年去美国。初期同朋友一同办左翼杂志，写书评。在国际救济中心认识了办事员罗丝，二人很快结婚并在思想上相互影响终生。以后罗丝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科塞也于 1948 年进了该系研究生班。这期间芝加哥大学到纽约招募教师，科塞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他自认为从教学中

收益颇多。但二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的哥大社会学系正值其黄金时期，教师中有莫顿、伯纳德·巴伯、金斯利·戴维斯、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林德等人，研究生班的同学中有利普塞特、皮特·布劳、古尔德纳和科塞的妻子罗丝等高材生。以帕森斯的高徒们为核心的哥大社会学系自然以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为其主导。在动荡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度过少年时代的科塞不能容忍一种不包容社会冲突的理论，成为结构功能领地中的异教徒，尽管他一直钦佩帕森斯。这个时候也开始阅读齐美尔的著作，并惊讶为什么过去没有发现其魅力，以后他一直认为齐美尔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最初的学位论文企图全面研究齐美尔，但指导教师莫顿不允许，莫顿要求他怀抱更大的独创欲。于是他选择了齐美尔著作中的一节“冲突”，去阐发和开拓。论文题目是“社会冲突的功能”。1954年他获得哥大的学位，两年后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同名著作出版。这本书虽获好评，却波澜不惊，50年代时该书只卖出三千册。然而60年代风向骤转，美国社会中人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冲突此起彼伏。人们渴求一种理论上的解释，结构功能的理论无助于此，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又相形遥远，米尔斯的著作引起广泛兴趣，可惜米尔斯在1962年英年早逝。当时只有三部著作表现出对社会冲突的更为宏观的视野，却不是仅仅将冲突视为社会疾病，或只看到其负面作用。它们是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格鲁克曼的《非洲的习俗与冲突》，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科塞的著作遂名声鹊起，被翻译成六七国文字，成为社会学专业的必读书。很快他又写出《社会冲突研究续篇》，但影响不如前书。两书的问世及其影响使他成为社会学理论中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不愿意披戴“冲突科塞”（近似“年糕张”的一种

称号)这样的紧身衣冠,遂开始了冲突理论之外的研究和著述。先后写出《理念人》、《贪婪的制度》、《社会学思想大师》、《一束荆棘花》、《在美国的流亡学者》。科塞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任该会执委十年,以后又任学会理事。还曾担任美国东部社会学学会主席,社会问题研究会主席。

鲜为国内读者乃至社会学家了解的是科塞的另一种社会角色。成年后的科塞虽然失去了早年对社会主义的乐观态度,却仍然保持着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并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自赴新大陆后一直为 *The New Republic*, *The Nation*, *Partisan Review*, *Politics*, *Commentary* 等杂志撰稿,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麦卡锡时代来临后,科塞和他的朋友感到发表文章日益困难,便在 1954 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异议》(*Dissent*)。那时他们以为这份刊物一定是短命的,估计能维持一至三年,想不到这刊物竟生存至今。《异议》每期销售一万份,不是大众读物,却是美国左翼自由派受人瞩目的声音。

这样,科塞在美国一直扮演着两种社会角色。一方面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坚持着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评论。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成功的两栖动物。

今年科塞应该是 88 岁高龄了。

(郑也夫撰文)

前 言

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朱利安·本达
(Julien Benda)

身为知识分子但并不聪明，这种人即使不是不可能存在，也十分罕见。不是知识分子又很聪明，却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自诩，我们总能在镜子中与他相见。

——H.W. 福勒 (Fowler)

现代用语中很少有像“知识分子”这样不精确的称呼。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它是指很不可靠和令人厌恶的人品，还有些人则认为，它

是指令人向往但经常难以企及的优秀品质。对一些人来说，知识分子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给严肃的生活事务带来麻烦，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们则是“人类的触角”。这个名称语焉不详，以及对它的评价所存在的分歧，使我必须明确它在本书中的含义。这里的定义，像其他场合一样，远远谈不上不偏不倚，却会带来某些成果。

有些作者倾向于用“知识分子”一词概括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或用西摩尔·利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的话说，是“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这里的文化是指由艺术、科学和宗教组成的人类符号世界”。^①本书不打算采用这个宽泛的定义，尽管它也许有不少实际优点。因为它模糊了一部分人数虽少但性质十分重要的符号操作者的特点，他们的属性无法在大量从事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人身上看到。

不是所有学术界的人或所有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对这个事实有人遗憾，也有人赞许。理智（intellect，“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一词的词根。——译注）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理智是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一面。智力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理智则从事检验、思考、怀疑、理论化、批判和想像。”^②马克斯·韦伯对靠政治谋生和为政治而生的人之间所做的著名区分，也适用于我们这里的讨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大多数人在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他们表现得“对神圣事物非常敏感，对他们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③

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④。现代知识分子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是坚持神圣传统的教士们的继承人，然而他们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远离宫廷和犹太会堂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罪恶行径的狂人的后代。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诸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

我们也可以把中世纪的宫廷弄臣，算作知识分子的祖先。弄臣的角色，像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所说明的^⑤，他不担任任何固定角色，享有非常的特权，不必遵守通常的礼仪，因为他处在社会等级制度之外，因而也被剥夺了里边的人所享有的特权。他的力量在于他不受社会等级制所要求的正常举止的约束。他处于地位卑贱者之列，同时他却得到允许，可以批评甚至嘲讽权贵。他可以揭露最令人不快的真相而不必担心报复。倘若他饰以玩笑逗乐的伪装——这是为了否认或减弱其攻击的严肃性——他可以对人人都接受的事实提出疑问。不过，即使他在逗乐，他还是使掌权者感到狼狈。他虽然得到容忍甚至奖赏，但他总是面对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左右为难的反应，因为他的机智和戏谑几乎掩饰不住他的批判锋芒。

现代知识分子类似于弄臣，不只是因为他为自己要求不受限制的批评自由，还因为他表现出一种态度，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戏谑”（playfulness）^⑥。当认真的实干家集中精力于眼前的事务时，知识分子们却醉心于精神娱乐，而且纯粹是为了玩味。约翰·休津加（Johan Huizinga）认为，娱乐是可有可无的、无关利益的和自由的活动。它不属于“寻常”生活，处在直接需求和欲望的日常满足之外，它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在自身中求得满足。^⑦知识分子倾向于回避对技术专家来说十分熟悉的智力活动，这种活动需要为达到特定结果严格寻找规范的手段。他喜欢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得到乐趣。正像艺术家一样，一组公式或一种语式所具有的美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比它的实际应用或直接用途更重要。对他而言，理念远远不是只有单纯的工具价值，它们具有终极价值。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也许不比别人多，但他们的好奇心，是凡勃伦（Veblen）贴切地称为**闲情逸趣**的好奇心。

凡勃伦没有把“闲情逸趣”等同于“不重要”或“无意义”，或暗示知识分子们只是些好玩耍的蜻蜓。相反，想必他会认为，他们通常都是有所执守的人，对于他们，理念的冲突事关重大。他们的戏谑，缺乏对身边直接事务的关心，只是他们笃信一种广泛的价值体系的另一种表现。知识分子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严肃地看待理念，这种严肃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可能只有模糊意识的各种利益和愿望。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名言说，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⑧，他们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

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

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要说明的那样，每个知识分子无疑都多多少少表现出以上描述的这些特征。一些人可能更多地从事戏谑，另一些人则是最真诚的先知。我这里的目的是描绘典型的关切和取向，而不是个别人的混合表现。我清楚自己有可能受到指责，说我有着把自己描绘的群像理想化的倾向。我只能向读者保证，在描述和分析本书中的具体事例时，我力求尽可能忠实地描述这些人物，不做任何粉饰。

知识分子不但让一般公民感到迷惑不解，还使他们心神不安。但是缺了他们，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⑨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有着知识分子倾向的人，无疑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保罗·雷丁（Paul Radin）提醒我们，甚至在远古时代无文字的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人，他们个人的性情和兴趣，使他们专注于我们习惯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⑩。不过我认为，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更具体地说，我承认智者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后人，可以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远祖，不过我认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只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他们是一种近代现象，他们是随着近代史的开端而登场的。伯里（J. B. Bury）就近代史的开端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如果我们想在连续不断的历史之流中划出任

何有用的分界线，我们必须置各种预期和宣告于不顾。我们需要毫不犹豫地，在知识和思想领域，近代史开始于17世纪。”^⑩

在中世纪社会稳固的大厦倒坍之后，在唯名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打破了一统天下的教会世界观之后，在宗教团体、世俗权力和政治体系开始竞相争取个人的忠诚，而个人不再被束缚于他们的传统地位之后，在新的阶层努力为自己开辟进入以前受封建传统的拥护者主宰的社会舞台的道路之后，理念的人才开始看到一些条件，它们有利于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气质特殊且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文化人不再局限于阐释惟一正确的教义或被当作异端消灭。随着多重权力中心和咨政团体的出现，随着被冻结的文化开始融解，兴起了理念的斗争，从而也有了自由的可能，虽然这种自由最初只能在社会的缝隙中实行。确实，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知识分子缺乏能够对其宣讲自己思想，并能够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支持的独立公众，他们经常被迫充当专家或文书，依附于有权有势的庇护人，正像今天为不识字的穆斯林商人效力，在集市上给他们处理生意的文书一样。但尽管如此，彼此竞争的庇护人很多，使文人能够在他们中间加以选择。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存在选择的可能，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只有当庇护人制度开始衰落，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需求知识产品的更为广大的公众之时，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它自那时以来开始发展，这也正是本书所限定的时期。

在此就写作过程聊赘数语：从刚开始计划写这本书时，我就认识到，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做出慎重的限制。很明显，一部包罗万象的知识分子社会学，需要毕生的时间写作，并且会写成一部多卷本的大部头著作。我没有这样的愿望和打算，因

此我必须对这个主题进行严格的限制。本书所能讨论的，只是众多知识分子流派中对现代世界造成震动的少数几个流派。讨论许多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浪漫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诱惑也不得不加以抵制。同样，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如果去讨论一些具体个人的作用和生平，此书将会达到难以驾驭的规模。为了避免成为包罗万象的怪物，本书仅限于讨论某些一般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化背景，它们对西方世界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发展，起过有利或阻碍的作用。除了很少的特殊例外，本书集中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而不是个人生平。即使如此，我仍要做到宁精勿滥。我将讨论圣西门主义者而不是傅立叶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而不是欧文主义者，雅各宾党人而不是吉伦特党人。我始终关心的是某些可称之为近似“纯粹”社会学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和取向上的众多历史变化。我希望读这本书的人，把它作为一本历史社会学著作，而不作为一本编年史读物。社会学家绝对不可打算与能够借助丰富的文献和各种历史经验的史学家一比高下。他只能希望通过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典型，能够对超越历史特殊性领域的各种趋势加以比较。我在下面力求本着一种谦逊态度所做的事情，便是这样一种比较。

注 释：

①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0), p. 311.

② Richard Hofstadter, *Anti - 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3), p. 25. 我从这本价值非凡的著作中学到了大量东西。

③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 (October, 1958), p. 5.